

陈云传

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编 金冲及 陈群
副主编 曹应旺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 云 传

(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 编 金冲及 陈 群

副主编 曹应旺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云传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 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73-4320-5

I. ①陈… II. ①中… III. ①陈云 (1905~1995)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2263 号

陈云传

编 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编: 金冲及 陈 群

副 主 编: 曹应旺

责任编辑: 杨茂荣 田雪鹰

责任印制: 寇 炫 郑 刚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电子邮箱: zywx5073@126.com

销售热线: 010-63097018、661833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118.25 印张 136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2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4320-5 定价: 360.00 元 (全 4 卷)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卷目录

三十六、粉碎“四人帮”以后	(1451)
三十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486)
三十八、在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的日子里	(1523)
三十九、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1566)
四十、 倡导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	(1637)
四十一、推动干部年轻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	(1711)
四十二、重视宣传文化教育事业	(1765)
四十三、晚年岁月	(1795)
后 记	(1866)

三十六、粉碎“四人帮”以后

毛泽东逝世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大家都觉得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但反复研究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状况后，觉得应该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十月初，叶剑英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后来回忆道：

“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间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

“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即邓颖超——引者注）正在一间房子里谈话，我在外面的一间房子里等。邓大姐出来的时候见到我说，好久不见叶帅了，我是来看看叶帅的。我也说是来看看叶帅的。邓

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①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②。当天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叶剑英在两个多月后回顾这场斗争时说：

“‘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但是，这并不要紧，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是能够通过推行。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

① 陈云办公室对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来函的答复，1990年2月12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一直拖延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

叶剑英说：

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毛主席逝世了，客观形势出现了一个投鼠不要忌器的有利条件。”“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结果，不露一点声色，不走漏一点消息，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就把这一很重大的任务完成了。”^①

粉碎“四人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成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十月七日上午，陈云得到王震带来的好消息。他们愉快地进行了交谈。

为了巩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共中央连续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十月七日到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这次事件，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将此件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还调整和加强了十几

^①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以及中央党政军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二十一日，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陈云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兴致勃勃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一盛大集会。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七十一号。他虽然还没有恢复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十月十六日，仍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与陈云有着深厚战友情谊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切中要害，恳切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十八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送出前，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一张便条：

“十月十六日你在电话中要我把我向你提的意见写给你，现已写出，并与王震、姚依林同志一起议过，他们也同意。特遵命送上，供你参考。妥否，请酌。”^①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

“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

接着，陈云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出发，谈了他对当前工作的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

① 陈云给李先念的信，手稿，1976年10月18日。

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需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防止这次运动中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①

^① 陈云给李先念的信所附的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应注意的事项，手稿，1976年10月18日。

这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就提出的这些重要意见，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渴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很快出现新的局面。然而，事实却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地发展，而是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徘徊时期。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据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说：在这篇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①对这一明显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提法，陈云阅后陷入了沉思。

在陈云看来，粉碎“四人帮”后，无疑要使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但是，要使党和国家真正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首先必须拨乱反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冤假错案，否则不可能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重申：必须为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必须尽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而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定的，提出“两个凡是”，这两件事就不能改变。

^① 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1978年12月13日。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在党内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共一百六十多人。会议依照过去的习惯，按六个大区分成中南、西南、西北、华东、华北、东北六个组。中央直属的党政军各单位负责人不单独编组，分别参加六个组讨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程有三项：一、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二、商定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分两个阶段。考虑到当时全国计划会议就要结束，所以先请余秋里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向会议作汇报说明，然后分组讨论。三月十四日，转入第二阶段，讨论揭批“四人帮”和下半年工作安排问题。

陈云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在西南组。他除参加五次全体会议中的四次外，还参加了两次分组讨论。

三月十三日上午，陈云来到西南组，并作了书面发言。这份发言，是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后，先同胡乔木商量，随后在耿飚家里，征求耿飚、王震、萧劲光、王净的意见，才提出来的。陈云后来回忆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噢，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

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引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①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首先高度评价了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他写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接着，他提出粉碎“四人帮”后面面临的两件大事以及他的看法。他说：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上，陈云只是重申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他写给李先念那份意见中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明确提出：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这份书面发言的最后说：“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

^①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80年11月11日。

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①

陈云选择三月十三日在西南组提交这篇书面发言，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原定计划，这一天，第一阶段的议程就要结束，十四日将转入第二阶段，即揭批“四人帮”和讨论下半年工作的安排。

但是，陈云的书面发言，没有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当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时，遭到陈云拒绝。

三月十四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邓小平问题时，他说：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关于天安门事件，讲话中仍说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最后强调说：“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

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①

三月十七日上午，陈云参加西南组讨论。在会上，他从维护大局出发，作了有保留的发言。他说：揪出“四人帮”后，当时我的想法同华国锋同志“讲的是一样的”，“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②后来，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跟邓小平同志讲：“你碰到问题该斗必斗，有斗不赢的时候，挂个号，记录在案。”^③

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中共中央。信中说：“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邓小平在信中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于五月三日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陈云在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后，五月四日启程赴杭州，休养了近两个月。七月初，又在上海休养了几天，才回到北京。这年，他已经七十二岁了。

在杭州休养期间，陈云的身体仍不好，他又想到多年难以忘怀的评弹。当时，粉碎“四人帮”刚刚七个月，各项工作，包括评弹都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江青、张春桥的干预下，

①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②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西南组第10期，1977年3月17日。

③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1日。

“文化大革命”中的评弹变传统的一人多角、注重说表为一人一角、加重表演，琵琶还要用钢丝弦，以表现“革命性”。各种流派也要取消，说什么“不要流派要革命派”，许多艺人演唱时一味高腔高调，“评弹已不像评弹了”。

陈云来杭州后，从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日，先后九次观看了苏州、无锡评弹团和浙江省曲艺团的演出，并在自己的住地约来二十多位评弹界人士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趁我现在还有点空闲时间，我要自己找工作做，免得将来忙了，评弹就没时间抓了。”^①并且提出要召开一次小型的评弹座谈会。

为开好这个座谈会，他写好一份《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是这样写的：

“（一）团结起来，揭批‘四人帮’。”“‘四人帮’破坏了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

“（二）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

“（三）说新书。”“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当然，也不排除在若干年后利用评弹传统节目中经过整理的有益的片段，但目前应该积极努力，坚持说好新书。”

“（四）繁荣创作，积累书目。”“短篇、中篇、长篇都要。题材应该多种多样。”“重新审查解放以来创作（包括改编）的新书目。凡审改后适宜于当前演唱的，都让他们上演。”

^① 施振眉《评弹界的“杭州会议”——纪念陈云同志主持召开评弹座谈会二十周年》，见1997年6月10日《浙江文化报》。

“（五）城镇书场和农村书场。”“我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四个现代化，农业排在第一位。评弹应该逐步增加到农村去说书的比重。”

“（六）说长篇，放单档。”“这可以发挥轻骑队的特点。”

“（七）琵琶不用钢丝弦。”“用了钢丝弦，音太响，太刺耳。不用钢丝弦，有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延长艺术生命。”^①

座谈会召开前，这份意见先在与会人员中传阅。

六月十五日上午，评弹座谈会在陈云住地举行。为了深入讨论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多，只有六人。

陈云亲自主持座谈会。他说：“打倒‘四人帮’八个月来，评弹回到了自弹自唱，基本上像评弹了，是有了进步的，虽然有缺点，这样也就很好了。这些成绩要巩固，评弹要像评弹。”他进一步强调说：评弹“可以有所改进，但不要像张春桥那样的‘大改革’。各种东西都可以改进，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

对评弹节目的内容，陈云提倡说新书。他说：“传统书目里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是现在要说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陈云还说：“现在书目太少。”可以组织若干创作小组，“开始先搞一回书，逐步变成中篇、长篇”。“书目要逐步丰富、加工。开始粗一点不要紧，可以由粗到细。”

对书场问题，陈云说：“过去我给你们说，江浙评弹听众

^①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78 页。